相较于德国，日本官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争罪行的反省远远称不上足够，这一点不仅为世人所知，而且深受那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和同情者的诟病。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内部的，即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有着漫长的历史传承，至少可以追溯至裕仁天皇的祖父明治天皇时期，并且此政策不由某一党派所把持操纵，几与日本的近代化历程息息相关，甚而互为表里。而外部的原因，则要到战败后的美国军事占领期间去寻找。

似乎对于那些政客而言，实际而真切的政治利益的考量要重于民众的激烈情感。蒋介石在内战期间转头便雇用起昨日不共戴天的侵华头领为军事参谋，毛泽东亲口表达对日本的侵略给中共最后夺取全国政权雪中送炭的感谢，美国人在这一点上也分毫不差。同盟国在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太上皇”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幕僚们以为，审判裕仁或者类似的直接危害天皇制的举措，极有可能使美军在日本本土重又陷入一场消耗巨大的战争（鉴于苏联在柏林的巨大损失），于是，麦克·阿瑟选择既不会审判这场战争最终的负责人，更不会取消天皇制度。这个方针执行到后来，带有了越来越多的荒谬意味，美方完全忽视了逐渐涌现的与其当初判断相悖的种种证据——也许，更多的日本国民此时关心自己的温饱远甚于天皇陛下的存灭——占领当局甚至一度表现为最大的保皇派角色，似乎保护天皇既是目的又成了行动的唯一理由。

同样的现实主义政治策略被运用于对日本政府的“民主”改造之中，在美国人意志的完全操控之下，新的宪法与相应的民主制度被从上至下强加给日本的民众，但却基本保留了旧式的官僚集团来实际执行相关政策。麦克·阿瑟盟军最高司令部一下创造了两个悖论，不由民众决定而是外力强加的民主制度，最为保守主义的集团来执行所谓彻底的“改造”方略。加之后来意识形态竞争的加剧，日本在美苏争霸地缘上的重要地位，更使得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暴行记忆被无情的压制。

纵观历史，美国在关乎他国命运的关键性节点，少有能运用好手中的决定性的力量的时候，即使是单单从为自身谋取未来之利益的角度来看都是极不成功的（苏联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糟糕，而英国的手段则往往最为圆滑、机巧）。短视与浅薄无知的狂妄自大为不远的将来埋下蓄势待发的重磅炸药，不仅未能实现当初的设想，常常是又创造了新的难题。这或许是强盛期的帝国的毛病吧，既然无需费大的力气便可得到非凡的收获，自然就没有谨慎的动力。